

# 三台鄮江崖墓“狗咬耗子”图像再解读

宋超（《历史研究》杂志社）

摘要：四川三台鄮江崖墓中的“狗咬耗子”图像，引起众多研究者的重视。本文依据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，对图像内涵重新作了解读，认为是反映墓主世俗生活的一种表现。

关键词：鄮江崖墓；汉代画像；狗咬耗子；图像解读

中图分类号：K879 文献标识码：A 文章编号：1003-6962(2008)06-0069-05

四川三台鄮江崖墓金钟山 区一号墓，位于前室右壁后端下部，刻有一只“立耳，长吻，尖牙，四肢肌肉发达，前肢直立，后肢弯曲呈蹲坐新状，双眼炯炯有神”的狗，口中“得意地叼着一只长尾老鼠”，整理者将之命名为“狗咬耗子”图<sup>[1]</sup>。对于这样一幅出现东汉晚期，十分罕见的刻石画像，引起研究者的重视，整理者对此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，将是图所刻画之狗，与汉代墓葬石刻画像中常见的“雕刻在墓门附近或正对墓门”的“守犬”归为一类，是为“地下世界驱鬼镇墓类”，认为：

狗在当时的现实社会中能看家护院。但把狗作为重要内容着意雕刻在墓室内的明显位置，当有特殊寓意。汉代人认为鼠为鬼怪恶物，能作祟做鬼。晋干宝《搜神记》卷一八和唐欧阳询《艺文类聚》卷九五注云：“谚云，鼠得死人目则为王”，记有老鼠窜入坟墓，噬食尸体，祸及死者形骸，作祟之事。为祈求死者在地下的安宁，就要灭鼠驱怪，正如紫 M1 前室壁上雕刻的那只被捕捉后悬挂在半空的老鼠，其状可怜。狗捕鼠自古有之，《吕氏春秋·士容篇》：“齐有善相狗者，其邻籍之以买取鼠之狗……因此犬能胜鼠，能保护墓主不受鼠鬼之害。如金 M1 内雕刻的狗咬耗子画像……尽心竭力地保护着墓主在地下鬼魂世界的安宁<sup>[2]</sup>。”

整理者同时表明，汉代画像的物象，“从含义上讲，却具有一定的多义性。一种物象因为位置或物象间组合的不同，有时可以同时具有几种不同的含义，可以进行多种解释”。鉴此，笔者试图在整理者研究的基础之上，对“狗咬耗子”图像进行再解读。

—

整理者依据晋干宝《搜神记》卷 18 和唐欧

阳询《艺文类聚》卷 95 注云：“谚云，鼠得死人目则为王”，作为“汉代人认为鼠为鬼怪恶物，能作祟做鬼”的论据，此说似乎不确。查晋干宝《搜神记》卷 18，不见有“鼠得死人目则为王”的记载，可能是整理者误记。不过，《搜神记》卷 18 关于“鼠”有如下记载：

魏齐王芳正始中，中山王周南为襄邑长，忽有鼠从穴出，在厅事上，语曰：“王周南，尔以某月某日当死。”周南急往，不应。鼠还穴，后至期复出，更冠帻皂衣而语曰：“周南。尔日中当死。”亦不应。鼠复入穴，须臾复出，出复入，转行数语，如前日。适中，鼠复曰：“周南，尔不应死，我复何道。”言讫，颠蹶而死，即失衣冠所在，就视之，与常鼠无异<sup>[3]</sup>。

这段记载，《晋书》卷 29《五行下》亦载，文字略异。不同者干宝《搜神记》仅记录了这一故事，而未作释；而《晋书》则引班固“黄祥”说，释为由于“曹爽专政，竟为比周，故鼠作变”以警告之<sup>[4]</sup>。

至于欧阳询《艺文类聚》卷 95 所引“谚云，鼠得死人目则为王”云云，又见《广博物志》诸书，但均出于刘宋时人刘敬叔所撰《异苑》一书，关于是人书，四库馆臣曰：

《异苑》十卷，宋刘敬叔撰。敬叔，《宋书》、《南史》俱无传，明胡震亨始采诸书补作之……称宋高祖为宋武帝，直举其国号名讳，亦不似当时臣子之词。疑已不免有所佚脱窜乱。然核其大致，尚为完整，与《博物志》、《述异记》全出后人补缀者不同。且其词旨简澹，无小说家猥琐之习，断非六朝以后所能作，故唐人多所引用<sup>5]</sup>。

《异苑》卷 3 载其文如下：

西域有鼠王国，鼠之大者如狗，中者如兔，小者如常。大鼠头悉已白，然带金环枷。商估有

经过其国。不先祈祀者。则啮人衣裳也。得沙门咒愿，更获无他。释道安昔至西方，亲见如此俗。谚云：鼠得死人目睛则为王<sup>[6]</sup>。

从以上引文可知，刘敬叔其人由于未见诸史记载，其事迹是由明人补缀而成；其书虽有“佚脱窜乱”，但大体上可信，故为唐代欧阳询等人所信从。然而核之《异苑》全文，所谓“鼠得死人目睛则为王”云云，则为西域鼠王国诸鼠称王之先决条件，似与鼠之为祸死人无涉。《艺文类聚》诸书所引均出自《异苑》，刘宋虽去东汉晚期不远，然相距亦有二百余年，况且汉代不见有其他相类之资料作为佐证。因此，笔者以为，似乎不能将刘宋时期出现鼠之作祟遗祸死人之观念，视作汉代人观念，至少这一观念在东汉晚期尚缺乏社会的普遍认同，将金 M1 的“狗咬耗子”图，及紫 M1 所见“鼠”图，视为“保护着墓主在地下鬼魂世界的安宁”的观点，似还有继续讨论的余地。

## 二

鼠与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关系密切，对社会的危害很早就为人们所认识，反映在早期历史文献中，鼠之为祸最突出的表现是对人们劳动果实的盗取与破坏，以致形成了诸如“硕鼠”、“仓鼠”等概念，并且从中引申出许多其他含义，以表示人们对鼠害的痛恨之情。

例如，所谓“硕鼠”，《诗经·魏风·伐檀》有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。三岁贯女，莫我肯顾”；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麦。三岁贯女，莫我肯德”；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苗。三岁贯女，莫我肯劳”三篇著名的诗篇，除去历代注疏家所引申的社会意义外，如所谓“刺重敛”等，鼠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则是全面的。

再如所谓“仓中鼠”，著名者如李斯之故事。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载：

李斯者，楚上蔡人也。年少时，为郡小吏。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，近人犬，数惊恐之。斯入仓，观仓中鼠，食积粟，居大庑之下，不见人犬之忧。于是李斯乃叹曰：“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，在所自处耳！”<sup>[7]</sup>

鼠除危害粮食之外，亦有“盗肉”而受遭判决之故事，《史记·张汤列传》载：

张汤者，杜人也。其父为长安丞，出，汤为儿守舍。还而鼠盗肉，其父怒，笞汤。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，劾鼠掠治，传爰书，讯鞠论报，并取鼠与肉，具狱磔堂下。其父见之，视其文辞如老狱吏，大惊，遂使书狱<sup>[8]</sup>。

与之相类似的故事又见《汉碑集释》所收《唐公房碑》：

〔君字公房，成固人，盖帝尧之〕□□□。□□□□，□□□〔之〕，故能〔举家〕□□□□□〔去〕……耆老相传，以为王莽居摄二年，君为郡吏□□□□……是时〔府在西成，去家七百余里。休谒〕往徕，〔转〕景即至，阖郡惊焉。白之府君，徙为御史。鼠〔啮藩车被具，君乃画地为狱〕，召鼠诛之。视其腹中，果有被具<sup>[9]</sup>。碑文虽残泐不清，且更具故事性，然唐公诛除盗啮诸物之鼠的经过，与张汤审鼠如出一辙。

在现实生活中，由于管理不善致使“仓鼠”造成损者，管理者是要受到相应的处罚。秦睡虎地秦墓竹简《法律答问》就有如下条文：“仓鼠穴几可（何）而当论及谿？廷行事鼠穴三以上赏一盾，二以下谿。鼠穴三当一鼠穴”<sup>[10]</sup>。意为仓中发现三个鼠穴罚一盾，二个鼠穴以下申斥，三个小鼠穴合一个鼠穴。

在传统农业社会中，鼠害对于人们的生活影响之大不难想见的。特别是在集中存粮食等生活必备品的仓廩，由于其相对封闭的环境及相对落后的捕鼠方法，鼠之为害更剧于他处，故李斯则有“仓中鼠”优于“厕中鼠”之叹。可能正是出于对“仓鼠”为害“仓廩”的痛恨，在紫 M1 中同时既有仓廩的图形，又有倒系老鼠的画像，或许正种观念的反映。

## 三

鼠之为害之剧，如何消除鼠害自然是人们试图解决的问题。从整理者所引《吕氏春秋·士容篇》：“齐有善相狗者，其邻籍之以买取鼠之狗……”，以及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所谓“仓中鼠”与“厕中鼠”，一是“食积粟，居大庑之下，不见人犬之忧”，一是“食不絜，近人犬，数惊恐之”来看，至少在秦汉时期，由于当鼠之天敌——猫尚没有广泛被人们驯养，狗则担负起“取鼠”的任务。

犬作为人类最早驯养家畜之一，除供人类食用外，捕捉猎物是为人类驯养犬的一个重要目的。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载：

二世二年七月，具斯五刑，论腰斩咸阳市。斯出狱，与其中子俱执，顾谓其中子曰：“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，岂可得乎！”遂父子相哭，而夷三族<sup>[11]</sup>。

在汉代石刻画像上，经常见到“田猎图”或“骑射田猎”中人们驱犬捕捉“獐、麋、豕、鹿”等较大猎物的形象，但对于捕捉较兔子体型明显

为小、且更为灵活的老鼠而言，犬实际上并不是合适的捕鼠者，上引《吕氏春秋·士容篇》所谓“取鼠之狗”，是经过“桎其后足”之后方可“取鼠”。大体可以说明在猫没有广泛被人类用于“取鼠”之前，“以狗取鼠”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<sup>[12]</sup>。睡虎地秦简《仓律》有如下条文：“畜鸡离仓。用犬者，畜犬期足”<sup>[13]</sup>。不允在粮仓“畜鸡”，因为畜鸡要消耗粮食；畜犬要以够用为度，虽然不能排除用犬取鼠的可能性，但更主要是用犬来护卫粮仓的安全。

秦汉时期，消灭鼠害可能更多是使用人工的方法，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《日书》有如下简文：

正月壬子塞穴鼠弗居

凡可塞穴置鼠潞困日虽十二月子五月六月辛卯皆可以为鼠<sup>[14]</sup>

以上两简其意虽不甚明确，但大意明白，可能是在某些日子适当的时辰，通过堵塞鼠穴或加固粮仓的方法，驱逐、防治或困杀老鼠最为有效。

除堵塞鼠穴外，亦有水灌烟熏之法。周家台三〇号秦墓有如下简文：“以壬辰，己巳、卯溉困垓穴，鼠弗穿”。《说苑》卷7《政理》载：“齐桓公问于管仲曰：‘国何患？’管仲对曰：‘患夫社鼠。’桓公曰：‘何谓也？’管仲对曰：‘夫社束木而涂之，鼠因往托焉，熏之则恐烧其木，灌之则恐败其涂。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，以社故也’<sup>[15]</sup>《汉书·刘胜传》载刘胜语曰：“臣闻社鼠不灌，屋鼠不熏。何则？所托者然也”<sup>[16]</sup>。除去“社鼠”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寓意外，水灌烟熏可能是古代灭鼠最常用的方法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周家台三〇号秦墓提供了一个用含毒的矿物“礬”灭鼠的“已鼠方”：

取大白礬，大如母(拇)指，置晋斧(釜)中，涂而燔之，毋下九日，冶之<sup>[17]</sup>，以“白礬”即“硫砒铁矿，也叫毒砂。为制砷及亚砷硫的原料，可入药，亦可杀鼠”<sup>[18]</sup>。唐人张鷟《朝野僉载》卷1录有动物后中毒后自行解毒的故事，作者曾亲自以礬石毒鼠以试探鼠自救之法：“礬石可以害鼠，张鷟曾试之。鼠中毒如醉，亦不识人，犹知取泥汁饮之，须臾平复”<sup>[19]</sup>。

除此之外，以机械捕鼠的方法也值得注意。《焦氏易林》卷4《井·坎》曰：“灸鱼桷斗，张伺夜鼠，不忍香味，机发为祟，柞不得去”<sup>[20]</sup>。可见“汉代的捕鼠机上装有诱饵，触发装置和捕杀装置，类于现代捕鼠器的基本构造，体现出汉人对捕捉老鼠所花费的苦心”<sup>[21]</sup>。

由此可见，虽然三台郪江崖墓画像中见有“狗咬耗子”的图像，可能正是因其比较少见，

故被人们所刻画于墓中，以表示对老鼠为害仓廩的痛恨之情，寄托以狗防治鼠害之希望。

#### 四

至于鼠之天敌一猫，考古资料证实汉代可能出现被人类驯养的猫用于捕鼠：“山东画像石上有猫蹲卧粮仓的图像，湖南出土的陶灶上也绘有猫听图像，是当时家庭畜猫防鼠的形象证据；北京大葆台一号墓出土有5只猫的残骸，则是当时养猫的实物证据”<sup>[22]</sup>。王子今先生《大葆台汉墓出土猫骨及相关问题》一文认为：

北京大葆台一号墓北回廊陶鼎和陶瓮内出土猫骨的考古资料，反映当时猫很可能作为“动物食品”介入社会物质生活。汉长安城城墙西南角遗址与其他动物骨骼同出的猫骨，据说“可能是人们吃剩的骨头”，被看作反映汉长安城居民“肉食资源充足丰富”的例证，可以与大葆台汉墓的发现联系起来分析。大葆台一号墓北回廊散见的猫骨，或许亦与殉葬的豹和马类同，有可能是墓主生前豢养的宠物猫的遗存。猫可能以“纵养”形式在防治鼠害的同时丰富了主人的休闲生活<sup>[23]</sup>。

汉代考古资料证实驯养猫的存在，除“可能作为‘动物食品’介入社会物质生活”外，是否已经普遍用于“防治鼠灾”，似无明确的史料记载以为佐证<sup>[24]</sup>。检索《旧唐书》之前诸史，猫之记录仅四条，《史记》与《汉书》明确所见“猫”字者有三条，均出现于注中<sup>[25]</sup>。第四条见隋文帝杨坚开皇十八年(598年)五月诏：

夏五月辛亥，诏畜猫鬼、蛊毒、厌魅、野道之家，投于四裔<sup>[26]</sup>。

所谓“猫鬼”，成书于隋时的《巢氏诸病源候总论》释曰：

猫鬼者，云是老狸野物之精，变为鬼蜮，而依附於人。人畜事之，犹如事蛊，以毒害人。其病状心腹刺痛，食入府藏，吐血利血而死<sup>[27]</sup>。

显然，“猫鬼”是与“蛊毒、厌魅、野道”相类似的害人巫术，但为何要以“猫”之为名，《隋书》卷79载，延州刺史独孤陀“好左道，其妻母先事猫鬼，因转入其家……陀婢徐阿尼言，本从陀母家来，常事猫鬼。每以子日夜祀之，言子者鼠也。其猫鬼每杀人者，所死家财物潜移于畜猫鬼家”<sup>[28]</sup>。事猫鬼者所以要在“子日夜祀之”，是因为子日属鼠，而猫能克鼠，故以“猫鬼”名之。

唐代以降，关于猫鼠的记录骤增，如《旧唐书》卷51《后妃上》载：

庶人良娣初囚，大骂曰：“愿阿武为老鼠，



吾作猫儿，生生扼其喉！”武后怒，自是宫中不畜猫<sup>[29]</sup>。

《旧唐书》卷37《五行志》载：

（大历）十三年六月戊戌，陇右洮源县军士赵贵家，猫鼠同乳，不相害，节度使朱泚笼之以献……中书舍人崔祐甫曰：“此物之失性也。天生万物，刚柔有性，圣人因之，垂训作则。礼，迎猫，为食田鼠也。然猫之食鼠，载在祀典，以其能除害利人，虽微必录。今此猫对鼠，何异法吏不勤触邪，疆吏不勤捍敌？据礼部式录三瑞，无猫不食鼠之目。以此称庆，理所未详”<sup>[30]</sup>。

可能自唐代以降，由于猫已成为防治鼠害的主力<sup>[31]</sup>，故对狗与鼠关系的看法则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。如南宋时人吕本中著“戒杀八首”，其中第五首诗曰：

纵犬使杀鼠，鼠窘生百畏。其饥使之出，此亦有何罪。犬鼠俱可杀，莫计有无功。苟以无功死，还与杀犬同<sup>[32]</sup>。

由于作者持“劝君普断杀”的态度，故反对“纵犬”捕杀出来觅食之老鼠。作者所以言犬不言猫，似乎曲折反映出由于是时猫之大量出现，以犬取鼠的行为已经不大为社会所认可，故对纵犬使杀鼠之行为表示不满。

综上所述，郪江崖墓金钟山 区一号墓所见“狗咬耗子”图像，可能是映墓主世俗生活的一种表现。在以猫捕鼠尚未普及的汉代社会，希冀以狗驱逐、捕杀为害仓廩的老鼠，从而维护墓主在冥界的安宁生活。这一寓意在郪江镇紫荆湾一号墓中也有体现：墓前室右壁刻有一只被倒缚老鼠的图像，而前室左壁则雕刻有仓廩模型，两者位置大致相对<sup>[33]</sup>，表明被缚捉的老鼠已经不能再为害仓廩，这似乎可为“狗咬耗子”图像再解读提供一个佐证。

注释：

[1]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绵阳市博物馆、三台县文物管理所编著《三台郪江崖墓》第15~16页，文物出版社2007年。

[2] 《三台郪江崖墓》第300页。

[3] 干宝撰，汪绍楹校注《搜神记》卷18第228页，中华书局1979年。

[4] 《晋书》卷29《五行下》第892页，中华书局1974年。

[5] 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第1208页，中华书局1965年。

[6] 刘敬叔撰，范宁点校《异苑》卷3第18页，中华书局1996年。

[7] 《史记》卷87《李斯列传》第2539页。

[8] 《史记》卷120《酷吏张汤列传》第3137页。

[9] 高文：《汉碑解释》第521~522页，河南大学出版社1985年。

[10]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：《睡虎地秦墓竹简·法律答问》第216页，文物出版社1978年。

[11] 《史记》卷87《李斯列传》第2562页。

[12] 刘宋时人刘义庆志怪小说《幽明录》中有一段故事颇耐人寻味：“吴北寺终祚道人卧斋中，鼠从坎出，言终祚后数日当死。祚呼奴令买犬。鼠云亦不畏此其犬，入户必死。犬至果尔。祚常为商，闭户谓鼠曰：“汝正欲使我富耳，今既远行，勤守吾房，勿令有所零失。时桓玄在南州，禁杀牛甚急。终祚数宰窃买牛皮，还东货之，得二十万。还时户犹阖也，都无所失，其怪亦绝。自后稍富。”（《太平广记》卷440《终祚》引《幽明录》第3587页，中华书局1961年）

[13] 《睡虎地秦简·仓律》第54页。

[14] 秦简整理小组：《秦汉简牍论文集·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《日书》释文》第71页、73页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。

[15] 刘向著，向宗鲁校证：《说苑校证》第166页，中华书局1987年。

[16] 《汉书》卷53《刘胜传》第2424页，中华书局1964年。

[17] 湖北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：《关沮秦汉墓简牍》第135页，中华书局2001年。

[18] 《汉语大词典》第7册第1115页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。

[19] 张鷟：《朝野僉载》卷1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[20] 转引自刘志平《〈焦氏易林〉的历史学考察》第88页及注4，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（未刊稿）2008年。文渊阁四库本作“灸鱼栖斗，张伺夜鼠，不忍香味，机发为祟，祟在头颈”。虽然文字有所不同，但基本意思相同。

[21] 彭卫、杨振红：《中国风俗通史（秦汉卷）》第403页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。关于汉代的捕鼠器，内蒙古额济纳汉代烽燧遗址出土有一件圆形器物，周围用草绳缠绕，若干木片均匀指向中心，整理者命名为“捕鼠器”（参见魏坚主编：《额济纳汉简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，图版见第290页）。

[22] 彭卫、杨振红：《中国风俗通史（秦汉卷）》第402页。

[23] 王子今：《大葆台汉墓出土猫骨及相关问题》，“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”会议论文（未刊稿），北京2008年5月。

[24] 彭卫、杨振红认为：“中国古代用猫捕鼠不晚于战国晚期。当时称猫为‘狸’……据刘向《说苑·杂言》，当时出现了价值百钱的狸，这种价格昂贵的狸应是专门培养出来用于捕鼠防鼠的猫。”（《中国风俗通史（秦汉卷）》第402页）可能正是由于汉代驯猫捕鼠的行为并不普及，因此才有价格昂贵的捕鼠之猫一狸，而且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猫之称名。可见汉代尽管有驯猫出现，但更可能是作为主人豢养宠物，似乎还没有普遍用于防

# 明初开国功臣墓志校正

邵磊 (南京市博物馆)

摘要：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，南京多次发现曾追随明太祖朱元璋南征北战的明朝开国元勋的墓葬，墓中出土的墓志实属研究元末明初社会变迁的第一手史料，弥足珍贵。本文在已出土的明初功臣墓志中，以文字完整与否为主要着眼点，拣选了蕲国公康茂才、东胜侯汪兴祖、永国公薛显等三人的墓志，结合史籍对其籍里、家世、行迹、历官、赏罚、生卒等问题，逐一进行了考证辨析。

关键词：明代；开国功臣；墓志；考证

中图分类号：K877.45 文献标识码：A 文章编号：1003-6962(2008)06-0073-09

## 一、蕲国公康茂才墓志

1974 年 4 月—5 月出土于江苏南京市中央门外小市镇安怀村康茂才墓上层墓室内<sup>[1]</sup>，现藏南京市博物馆。志盖长 67 厘米、宽 65 厘米、厚 18 厘米，盖面四周有宽 5 厘米、高 3 厘米的凸起边框，框内阴刻篆书“故荣禄大夫同知 / 大都督府事赠推 / 忠翊运宣力怀远 / 功臣光禄大夫湖 / 广等处行中书省 / 平章政事柱国追 / 封蕲国公谥武义 / 康公之墓”8 行 53 字；志身长、宽与志盖同，厚 20 厘米，志文楷书阴刻，无首题，正文 22 行，满行 22 字，标点如下（图一）：

公讳茂才，字寿卿，姓康氏。世为蕲州人，秉性平坦，尚义气，/ 乡里称之。当元之季，四

方云扰，遂起义兵，立战功，屯戍太 / 平之采石。岁丙申，率兵三千归附于 / 大明，授秦淮翼水军元帅兼营田使，守御龙江。张士诚犯 / 境，公出战，获其海舟，升亲军指挥使。复同总兵取枞阳，攻 / 皖城，获孙四海舟。及陈友谅来侵，与之力战，获士卒船马 / 无算。已而率舟师从征安庆、江、蕲、兴国、汉阳、武昌，并拔梅 / 家寨。攻龙兴，复败友谅八阵指挥于瑞昌。下庐州，又与陈 / 兵大战彭蠡，克武昌，进都护府都护。同大将取江陵、 / 湖南，进大都督府副使。取泰州，援宜兴，攻江阴之巫子门， / 捣淮安之马逻港，所获士卒与船马为多。继克湖州，战姑苏，围齐门，下无锡，而张氏遂亡。转同知大都督府事，阶至 / 荣禄大夫。同克汴、洛，驻师陕

治鼠害。

[25] 分见《史记》卷 116《西南夷列传》第 2992 页；卷 117《司马相如列传》第 3025 页；《汉书》卷 57 上《司马相如传上》第 2556 页。

[26] 《隋史》卷 2《高祖下》第 43 页，中华书局 1973 年。

[27] 巢元方等《巢氏诸病源候总论》卷 25“猫鬼候”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[28] 《隋书》卷 79《外戚独孤陀传》第 1790 页。

[29] 《旧唐书》卷 51《后妃上》第 2170 页，中华书局 1975 年。

[30] 《旧唐书》卷 37《五行志》第 1370 页。

[31] 此处举一例证说明这一问题。《诗·大雅·荡之什·韩奕》有“有熊有黑，有猫有虎。”对于其中“猫”

解释，一些疏家以为“按释兽之文，猫即虎之浅毛者。以上下文熊黑虎类之，知是猛兽，非捕鼠之猫也。”（明冯复京：《六家诗名物疏》卷 51《猫》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）但亦有如宋人陆佃将是“猫”释为捕鼠之“猫”者。如清顾栋高《毛诗类释》卷 17《猫》载：“陆氏佃曰：鼠善害苗，而猫能捕鼠，去苗之害，故猫之字从苗。《诗》“有猫有虎”。猫食田鼠，虎食田彘，故《诗》以誉韩乐。”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）显然，宋人以捕鼠之“猫”，释《诗》中与“虎”并列之“猫”，很有可能受到是时猫捕鼠早已为社会普遍认同的影响。正如上引唐崔佑甫所曰“猫之食鼠，载在祀典”。

[32] 吕本中：《东莱诗集》卷 19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[33] 参见《三台鄞江崖墓》第 67~73 页，图版第 93、100。